

杨岫的园圃经营思想略探

龚阔英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 杨岫作为清代中期陕西地区著名的农学家、理学家, 一生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教育, 形成了丰富的农业思想。以《知本提纲》《幽风广义》中的“树艺”条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了杨岫的园圃经营理论, 明确了杨岫对园圃重要性的认识, 指出了“阴阳说”及“三才论”是其园圃思想的根本。

关键词: 杨岫; 《知本提纲》; 《幽风广义》; 园圃

杨岫(1687—1785), 字双山, 陕西兴平人。关中大儒, 终身不事科举, “自髫年即抛时文, 矢志经济, 博学好问, 凡天文、音律、医、农、政治, 靡不备览。学宗孔孟, 以圣贤之心为心”。^[1]杨岫无意于功名利禄, 终身不事科举而着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一生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教育, 是清代中期陕西地区知名的农学家、理学家, 成就斐然。杨岫平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强调农业的重要性, 研究并推广农、桑、树、畜“四端”, 在农耕蚕桑等方面贡献突出, 其著作流传下来的主要有《知本提纲》《幽风广义》《修齐直指》等。关于杨岫的农业思想及实践活动, 学界研究成果颇丰^[2-9]。然而,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杨岫“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关学地位的研究, 或者对杨岫以耕、桑为代表的农业理论的研究等方面, 仅有个别文章涉及了《知本提纲》中所反映出的杨岫的畜牧思想, 而对于杨岫大农业思想下所谓“四端”之一的“树”, 也就是园圃经营, 尚缺少足够的讨论。基于此, 本文拟对杨岫的园圃经营理念及实践活动作一简单探讨, 以期对丰富杨岫的农业思想研究有些许帮助。

一、杨岫对园圃重要性的认识

杨岫的园圃经营思想主要体现在《知本提纲》和《幽风广义》之中。《知本提纲》全书共10卷, 分14章, 是杨岫开馆教学的讲义, 可谓其理学和农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正文止提大纲, 而其详尽且目全在注解”。^[10]书的注解是在杨岫的指导下由其学生郑世铎完成, 可以说是其思想的直接体现。《知本提纲》的《修业章·农则》部分专讲农业生产技术知识, 其中有“树艺”一条, 是杨岫对园圃经营的集中讨论。《幽风广义》则是杨岫恐《知本提纲》申言未详, 著之专言桑蚕事, 以在北方推广养蚕之道的书籍。书的末尾附有《养素园序》《园制》《养素园图》, 既是杨岫对其园圃经营思想的申述, 又是对其亲身实践的记录, 具有较高的价值。

对于园圃的认识, 杨岫在《知本提纲·修业章》“农则前论”开篇即言“四农必务其大全。耕以供食, 桑以供衣, 树以取材木, 畜以蕃生息”, 将“树”列为“四农”中的重要“一端”, 视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农则树艺”条中, 杨岫对“树”的重要性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 “夫材木者民事之助, 树艺者生材之原。宫室、器其赖以成, 果、蔬、花、药因以生。”在杨岫看来, 人们固然需要耕桑供给衣食以安身立命, 但宫室可以为人们提供遮风挡雨的藏身之所, 器具则是人们高效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重要依凭, 而这些民事之资本皆赖“树艺”之功。至于园圃所产的水果、

蔬菜、鲜花、药草之类, 更是与田耕相辅相成, 既可自食以改善生活, 又可货买以获得资财, 粮产不足时还可补给口粮, 可谓一举多得。若“树艺不讲”, 园圃不兴, “则宫室、器具之需, 果、蔬、花、药之用, 亦何能皆备乎? 是树艺之方更不可不急明也”。

同时, 杨岫还认为园圃是贤哲隐士的修身养性之所和文人士的畅达襟怀之地。“帝王以之养圣聪而同民乐; 富贵家以之识稼穡而为游息之所; 文人士以之畅达襟怀, 焕发神采; 高人逸哲以之作助道之资, 托为隐处; 农家以之树桑麻, 布果蔬, 为衣帛之藪, 且逍遥其中。”在杨岫的认识中, 隐逸之士应当自给自足、自娱自乐, 为了生计而与市贾天天打交道, 并不是可取之方, “如韩康之鬻药, 老莱之织屦, 君平之卖卜, 常常交易, 日日营物, 以之养素, 岂能纯白乃衷?” “何如园圃之事, 得之分内, 无欲自足”。如果置一园圃, 耕、桑、树、畜布置得法, 再加以细心经营, 岁可获大利, 人人可以丰衣足食。故而, “古者人皆有园以为乐利之本”。

二、以“阴阳说”“三才论”为核心的园圃经营哲学

(一) 阴阳说

在杨岫的农业哲学体系中, 阴阳相对与统一是促成万事万物生长的先决条件。《知本提纲》“一本帅元章”有“阴阳显迹, 有物成体”, 郑世铎注解道: “阴阳, 谓清浊动静对待之体也。”又说: “气之清而动者, 是为天火之阳; 气之浊而静者, 是为地水之阴。”^[10]清一浊、动一静、天火一地水, 既相互对待又合理统一, 共同促成了“有物成体”。农作物的生长也依赖于阴阳相合, “盖阳生为变, 阴成为化; 变则启其端绪, 发其新机, 化则脱其本根, 易其故形。阳变阴体, 阴化阳气, 阴阳和, 造化成, 而品汇繁昌。此耕道之大端也”。^[10]也就是说, 阳变阴化能够持续“滋润”农作物, 使其焕发新机, 脱去其故有的形态而不断生长。

在园圃作物的生长机制方面, 杨岫同样运用“阴阳说”来阐释其生发原理。杨岫认为, 草木乃是倒生, “头根向下, 吸乎地阴; 枝梢向上, 接乎天阳。天阳摄其头根, 地阴滋其枝梢。上下对待, 根梢并长”。对此, 郑世铎进一步解释道: “上统下曰摄, 下养上曰滋。草木依土倒生, 故天阳摄于上而贯于下; 地阴滋于下而达于上。阴阳互济于上下, 而头根枝梢一时并长, 实有对待之势矣。”^[10]所谓“天阳”即草木生长所需要的光、热、气, “地阴”即草木生长所需要的土、水、肥, 草木生长, 上靠“天阳”, 下赖“地阴”, 上下对待, 通达互济, 草木根梢并长。草木的果实也是阴阳对待的结果, “盖上摄者包于外而为皮壳, 下滋者凝于内而为肉核, 故谷粒、果

实皆含天地之象”。^[10]草木的移栽也要符合阴阳对待的原则,需要达到阴阳的平衡。草木既然以根部吸收“地阴”,以枝梢接收“天阳”,那么在移植时就要注意枝梢与根部数量的均衡,“或根多枝少,阳不足以摄,则多枯萎;或枝多根少,阴不足以滋,则多阻遏”。又:“体本植产,依阴土而寄生,木向春荣,得阳和而伸性。”郑世铎注解:“木体定植,必有所附;故依乎阴土,即无根梢,亦可寄生。日行黄道,进热退寒,而草木因之为荣枯。故秋冬,日道南行,阳和不足,木叶凋零,生气内敛。至春月,日道渐北,阳和渐盛,生气亦渐发,凡木值此,皆有向荣之象。盖既得阳和,其性始伸,方为栽栽之时也。”^[11]大意是说,植物依阴土而生存,得阳和而枯荣。秋冬之时,太阳南移,阳气不足,草木凋零,生气内敛,此时不宜移栽;到了春天,日道渐北,阳气渐盛,草木生长,生气萌发,是移栽的好时节。可见,在杨岫看来,阴阳相济,均调和平,才是万物化生的基础,只有将天时地利相结合,才能有效促成草木的生长。

(二) 三才论

“三才论”是我国古代人民基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所得出的农业理论。农业“三才论”最早见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其中有专论农业生产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审时》篇中首次阐述了农业“三才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12]将天、地、人作为促成作物生长收获的重要因素。明代马一龙拓展了“三才论”的内涵,提出“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之论。农业“三才论”为杨岫所继承,并贯穿于《知本提纲·农则》中,成为其农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岫主张,从事农业生产,必须遵循天时、地宜和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进行有效的、正向的人为干预,做到“天人合一”,才能获得成功,即所谓“盖禾,生之者地,养之者天,而成之者人。日进其功,所获无穷”。农业生产中,由于“土脉异其宜,风气殊其致,天星之钟育不一,物候之参差多端”,往往会使得作物的生长不尽如人意,而人的作用即在于调摄天地人物,了解和掌握“土宜、风气、星育、物候”,“相土而因乎地利,观候而乘乎天时”,达成天时、地利、物情、人事的和谐与统一。

杨岫“时宜、地宜、物宜”的“三才论”不惟体现在其粮食作物生产方面,在其园圃经营理论中亦有反映。如关于花草树木的种植,杨岫明确指出:“风土各有攸殊;大法贵相阙宜。”郑世铎进一步补充道:“日行三道,地分五带,其风土各有所殊,而所产之物亦异。即如荔、龙、波萝不能逾岭,橘、柚、橙、柑仅在淮地,梔子、瑞香产于川汉,茉莉、桂花盛于湖襄,以及晋之大枣,秦之柿、栗,燕之苹果,各甲于天下之类,不一而足,惟贵相土制宜,以收树艺之利,方为大法。若执拗不通,见闻有碍,强风土之所不宜而概为树艺,无异胶柱鼓瑟、按图索驷矣。”^[13]各地风土、气候不同,物产亦有所不同。倘若不相土制宜,强行栽植,死板而不知变通,是难以收到好的效果的。由于“物候之参差多端”,所以“种贵适宜,栽亦趋时”。^[14]比如桃、杏宜在五六月连肉种;桑宜小满后种;榆宜春三月种;椿、槐春秋皆可种;枣、梨、白果、海棠皆宜根分,春、秋、冬皆可移栽。物种不同,栽种的时间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只要符合“物宜”,经营各乘其时,“其利自兴矣”。园圃经营不仅要充分考虑到植物的种类、栽种的方式是否符合“物宜”,其栽植过程也要充分考虑“时宜”。所谓“春栽切忌叶生,秋栽务令叶落”,也就是说,栽植之时,均以春秋为限,“但春栽宜早,迟则叶生,内气已泄;秋栽宜迟,须候叶落,生气始敛”。^[15]如果不顾及时间而强行栽植,这两种情况下植物均难成活;即便是成活了,也不会旺盛茂密。总之,杨岫强调栽植草木,要依据当地的气候、土壤以及生物的遗传特性(物性)而定,不能盲目种植,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成功。

综上所述,杨岫作为清代中期陕西地区知名的农学家,对园圃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其将“树艺”列为“四农”中的重要“一端”,视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杨岫还将园圃视为贤哲隐士的修身养性之所和文人学士的畅达襟怀之地。杨岫的园圃经营思想主要包括“阴阳说”和“三才论”两个部分,这也是其农业思想的根本所在。杨岫的园圃经营思想是其大农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观念,尤其是“时宜、地宜、物宜”的“三才论”及具体的实践活动,对于现在园圃种植和发展综合性“大农业”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杨岫.豳风广义[M].郑辟疆,郑宗元,校勘.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
- [2]郭文韬.试论《知本提纲》中的传统农业哲学[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53-62.
- [3]齐文涛.从原理到推论的理论系统——《知本提纲》农学阴阳论研究[J].农业考古,2013(3):332-338.
- [4]胡文金.论清代农学的实用性趋向——以杨岫“天地水火气”五行为例[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4):178-183.
- [5]刘伟.杨岫农桑试验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 [6]李虎.论杨岫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J].农业考古,2007(3):320-324.
- [7]李富强.18世纪关中地区农桑知识形成与传播研究——以杨岫师徒为中心[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36(1):45-59.
- [8]陈加晋,李群.《知本提纲》畜牧思想探析[J].农业考古,2016(3):183-188.
- [9]林乐昌.论杨岫的儒学体系及关学史地位[J].中国哲学史,2020(6):75-82.
- [10]杨岫.知本提纲[M].民国:崇本斋藏板.
- [11]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作者信息:龚阔英(1983—),女,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陕西地方史。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知本提纲》整理与研究”(2017GJ05);陕西省“十二五”古籍重大整理项目《陕西古代文献集成》(初编)子项目(SG13001子168)。